



香港在國家及民族不同 發展階段的獨特角色： 從中共建黨到民族復興

研究專論第四十三號

宋恩榮



沪港发展联合研究所

SHANGHAI-HONG KONG DEVELOPMENT INSTITUTE

香港在國家及民族不同發展階段的 獨特角色：從中共建黨到民族復興

宋恩榮

復旦大學—香港中文大學
滬港發展聯合研究所

二零二六年九月

作者

宋恩榮，香港中文大學經濟系客座教授、香港亞太研究所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及滬港發展研究所副所長。

(本文根據作者於 2026 年 1 月 31 日第 20 屆滬港發展聯合研究所年會發表之匯報修訂擴充而成。)

滬港發展聯合研究所出版之刊物屬作者個人意見，不代表本所立場。

© 2026 香港中文大學滬港發展聯合研究所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Hong Kong's Unique Role in Different Stages of China's Development

Yun-wing SUNG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evolving role of Hong Kong across China's national development from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It argues that Hong Kong has functioned as a strategic interface between China and the outside world, contributing in ways across four historical phases: the "prequel to standing up" (1921–1949), "standing up" (1949–1978), "growing prosperous" under reform and opening (1978–2012), and "becoming strong" since 2012.

Using historical records and economic analysis, the study shows that before 1949 Hong Kong served as a revolutionary base, logistics and intelligence hub, and cultural and political platform linking China with the world.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ong Kong played a vital role as a trade window, source of foreign exchange, and channel for external engagement during periods of economic recovery and socialist construction.

During reform and opening, Hong Kong emerged as a key "super-connector," facilitating foreign investment, export-oriented industrialization, and China's integration into the global economy through its financial, logistics, and professional services. In the contemporary stage of national rejuvenation, Hong Kong continues to contribute through financial opening, RMB internationalization, high-standard trade governance, technological collaboration, and the projection of China's cultural and institutional soft power.

香港在國家及民族不同發展階段的 獨特角色：從中共建黨到民族復興

宋恩榮

摘 要

本文探討香港在中國國家及民族發展不同歷史階段中的獨特角色，時間跨度從 1921-2026。香港長期以來一直充當中國與世界聯繫的重要橋樑，在四個主要階段發揮了關鍵作用：革命時期是重要的「第二戰線」，也是物流、情報、宣傳的平臺；新中國成立後是對外聯繫窗口；改革開放時期成為“超級連絡人”，推動國家融入全球經濟；進入國家「強起來」的時代則在金融開放、人民幣國際化、創科及軟實力傳播等方面發揮獨特功能。儘管香港經濟相對比重有所下降，但其戰略意義未減，憑藉制度優勢與國際網絡，仍將在國家高水平對外開放和全球治理發揮重要作用。

“在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迎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
偉大飛躍中，香港同胞從未缺席。”

——習近平主席在慶祝香港回歸祖國 25 周年大會的講話，

2022 年 7 月 1 日

導 言

1839 年鴉片戰爭爆發，1941 年英國佔領香港，從此西方以武力逐步打開進入中國的大門，香港也成為中華民族百年屈辱的象徵。

此後香港能夠在國家及民族不同發展階段長期扮演獨特角色，源於香港迅速發展成為中國的主要外經貿樞紐。香港擁有天然深水港及自由港政策的優勢，先是取代澳門，進而在 1860 年代超越廣州，成為中國的主要轉口港。到了 1890 年，中國進口的 56% 和出口商品的 38% 都經過香港¹，香港成為東方最大的轉口港。自此，香港發展成為國家的國際貿易、航運、資金流、人員及信息往來的重要樞紐，奠定此後進一步發展的基礎。

1895 年甲午戰爭標誌了洋務運動失敗、維新及革命思潮興起。如眾所周知，香港在辛亥革命的過程扮演了不可替代的核心樞紐角色：香港是革命思想的搖籃、宣傳及輿論陣地，是經費與物資籌集及轉運中心。因為香港不受清廷管轄，革命黨人在起義失敗後可以

¹ 張曉輝，《香港與近代中國對外貿易》（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2000 年），第 2 頁。

退回香港躲避，並謀求東山再起；是以香港也是革命黨人的避風港。總括而言，香港是革命組織的大本營，也是武裝起義的策劃及指揮中心。

因篇幅所限，本文不著重闡述以上一段港人頗為熟悉、有關香港在辛亥革命的關鍵角色的歷史。本文聚焦辛亥革命之後的發展，重點分析從 1921 年中共建黨開始直到今天(2026 年)這個長達 105 年的歷史階段，香港在國家及民族不同發展階段的獨特角色。

雖然香港是中華民族百年屈辱的象徵，不過中共在 1949 年建立新中國的時候並沒有收回香港。中共當時對香港的指導性原則是「長期打算，充分利用」，中心思想是依重香港作為新中國對外窗口，幫助國家突破孤立，拓展有利建設的國際環境。後來中共於 1980 年代提出「一國兩制」這個史無前例的特殊安排解決香港前途問題，承襲了早年「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實用主義精神，可算是這精神的延伸。至於新近提出的、成為指導香港發展戰略的以「香港所長」服務「國家所需」的方針，貫穿了一個國家級戰略框架：包括共建「粵港澳大灣區」、融入「一帶一路」倡議、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等；這方針同樣承襲了早年「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精神，也可算是這精神的最新延伸。

當年「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指導性策略，一方面確立了 1949 年以來香港作為國家對外窗口的特殊地位，另一方面也促進了香港作為國際都會的進一步發展。本文首先探究「長期打算，充分利用」這個策略的源起，再進一步考察香港在國家民族每一個發展階段的特殊角色。

「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前世今生

中共第一代領導人一早便看到香港作為國家對外窗口的獨特價值：1949 年 10 月 16 日解放軍到達香港邊界，竟然勒馬深圳河，沒有收回香港。中共處理香港問題的核心戰略思想是「長期打算，充分利用」²，目的是在美國的封鎖下保留香港作為與西方溝通的窗口及橋頭堡。其後不過八個月韓戰便在 1950 年 6 月爆發，香港成為國家進口戰略物資的最主要港口；縱使聯合國 1951 年 5 月通過對中國實施全面戰略物資禁運，香港的愛國商人仍然通過走私方式繼續運送戰略物資，說明中共對香港「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政策確有先見之明。

其實早在抗日戰爭的時代，香港已經是中國進口戰略物資的主要港口。1937 年日本全面侵華，中國沿海海港迅速淪陷，直至 1941 年底太平洋戰爭，香港淪陷之前的四年間，中國抗戰所需戰略物資主要經香港入口。在八年抗戰最大的戰役，1938 年的武漢會戰中，日軍遇到頑強抵抗並死傷慘重。當時日本防衛廳的研究指出，「約 75% 的外援物質都是從香港經廣九鐵路運送到廣東和全國各地」³，有力地支持抗戰。為了切斷國軍的物資供應，日軍在 1938 年 10 月 12 日在香港附近登陸並於 10 月 21 日佔領廣州，切斷粵漢鐵路。幾天後國軍不得不棄守武漢，撤退到重慶。

日軍同時轟炸珠江及深圳一帶，以切斷香港通往內地的物資供應；

² 史海，〈新中國成立後中共「暫時不動香港」戰略始末〉，《中國新聞網》，2008 年 11 月 7 日，<https://www.chinanews.com.cn/cul/news/2008/11-07/1441344.shtml>。

³ 同上，第 4 頁。

不過香港以帆船和內河船拓展與珠江口東西兩翼的運輸網絡，繼續支援抗日，直至 1941 年底香港淪陷為止。

在扭轉現代中國命運的兩場最重要的戰爭 — 抗日戰爭及韓戰，香港都是中國的戰略物資生命線。

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言：“在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迎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中，香港同胞從未缺席”。香港是全國最開放的城市，在世界局勢急劇變動及地緣政治尖銳對立的今天，我們需要認真分析香港過往在國家及民族各個不同發展階段曾經擔當的獨特角色及關鍵作用，從而探索未來香港在「一國兩制」下如何以「香港所長」服務「國家所需」，協助國家應對當前複雜的地緣政治。

國家發展的不同階段

除了「站起來」、「富起來」、「強起來」三個發展階段，本文也涵蓋從 1921 年中共建黨到 1949 年建國期間長達 28 年的「建國前傳」。1949 年建國是中國人站起來的里程碑，是以本文把「建國前傳」稱為「站起來前傳」。這個前傳所以重要，是因為香港在這漫長的 28 年擔當了不能忽略的關鍵角色；況且在這期間不少中共高層領導人因革命的需要多次來港，他們對香港的獨特性有切身及深刻的體會；此後 1949 年中共以「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策略、以及在 1982 年以「一國兩制」方案處理香港問題，正是因為眾多中共領導人曾經多次來港，一早便明白香港作為國家窗口的重要性。

「站起來前傳」：從 1921 年建黨到 1949 年建國

在長達 28 年的「站起來前傳」，香港一直是中國革命的“第二戰線”，是軍事正面戰場之外的非軍事鬥爭領域，是中共革命活動的重要戰略基地。

「站起來前傳」包括以下四個階段：

1. 中共建黨及第一次國共合作（1921 - 1927）
2. 第一次國共內戰（1927 - 1937）
3. 八年抗戰、第二次國共合作（1937 - 1945）
4. 解放戰爭、第二次國共內戰（1945 - 1949）

1. 中共建黨及第一次國共合作（1921 - 1927）

從中共 1921 年 6 月建黨到 1927 年 4 月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約六年期間，香港是全國工人運動的橋頭堡及試驗田，孕育了中共第一代工運領袖。早在 1921 年 3 月，在中共建黨之前三個月，香港海員領袖蘇兆征及林偉文已經成立了中華海員工業聯合總會⁴，是中國最早的產業公會之一。

蘇兆征及林偉文都是廣東香山人，同樣出生貧苦人家，少年時先後到香港謀生，成為海員，從而認識當年常常乘船來往香山及香港的同鄉 --- 孫中山先生。兩人由中山先生介紹認識，於 1908 年加入同盟會，支持推翻滿清的革命。後來俄國在 1917 年爆發十月革命，蘇兆征在行船到海參崴時接觸到馬列主義理論，並介紹予林偉

⁴香港海員工會，〈工會簡史〉，《香港海員工會》，<https://www.hksu1946.hk/about>。

文⁵。

在俄國十月革命及五四運動的進步思潮影響下，蘇兆征及林偉文在 1922 年 1 月 12 日發動了震驚中外的香港海員大罷工，初時兩人與中共並沒有接觸。後來香港罷工工人紛紛返回廣州，中共廣東支部於 1922 年 2 月 9 日宣佈支持罷工，並在全國各地組織“香港罷工後援會”，有力地支持香港的大罷工，成功癱瘓香港經濟⁶。港英政府於 3 月 8 日被迫接受海員加薪要求，成為中國第一次工人運動的高潮，鼓舞了後來全國各地的工運，包括中共領導的安源路礦罷工、京漢鐵路大罷工等。

其後孫中山晚年的「聯俄、聯共、扶助工農」政策於 1924 年 1 月催生了第一次國共合作，中國的工運在中共及國民黨左派的推動下得到蓬勃發展，直至 1927 年 4 月北伐後蔣介石鎮壓共產黨為止。當時香港海員大罷工的領袖林偉文及蘇兆征在 1924/ 25 年間先後加入中共⁷，成為領導中國工運骨幹，期間最矚目的事件是長達 16 個月的省港大罷工。罷工從 1925 年 6 月維持至 1926 年 10 月，罷工觸發點是英國在上海及廣州租界的軍警開槍屠殺示威遊行民眾（上海五卅慘案及廣州沙基慘案），期間 25 萬參與罷工的香港工人回穗並封鎖香港。這個反帝、反英的運動，大大推動了全國工運及進步思想傳播。

⁵ 蘇兆征生平，羊城晚報-蘇兆征：工人運動鞠躬盡瘁 紅色精神流傳百年；林偉文生平，魏息平 湛風濤「論林偉民的政治思想及其時代價值」，《珠海潮》2019 第 2 期，170-172 頁。<https://sunyat-sen.org/html/jdxsmrsjk/lwmyjzs067.pdf>。

⁶ 人民網，〈中共初創時期在香港的活動〉，2014 年 3 月 3 日，<http://dangshi.people.com.cn/n/2014/0303/c85037-24510893-2.html>。

⁷ 劉蜀永，〈香港與中國共產黨〉，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2021 年 5 月 5 日，http://locpg.gov.cn/jsdt/2021-05/05/c_1211141804.htm。

2. 第一次國共內戰 (1927 - 1937)

1927 年國共分裂後，中共進行武裝鬥爭，先在井岡山建立根據地，再經過萬里長征轉移到延安。在這個內地革命陷入低潮的時期，香港變成危局的避風港和連接全國革命網絡的秘密交通樞紐。

在 1927 年蔣介石鎮壓中共後，廣東黨組織遭嚴重破壞。中共廣東黨部迅速遷至香港，在此領導全省及華南地區的隱蔽鬥爭和武裝暴動，成為華南革命的指揮部⁸。

依託自由港的特殊性，香港成為中央特科開闢的"上海—香港—汕頭—中央解放區"秘密交通線的關鍵樞紐。據載，包括周恩來、劉少奇、鄧小平在內的 200 多位領導曾幹部通過這條線路安全進入中央解放區⁹。

根據歷史資料，周恩來曾經最少三次來香港¹⁰。第一次是 1924 年 9 月，他受黨委派從歐洲回國參與領導大革命，途中探望當時在香港大學求學的南開老同學，在港大宿舍居住；第二次是 1927 年 10 月，中共南昌起義受挫，大批中共高層轉移到香港這個避風港，包括周恩來、葉挺、聶榮臻¹¹、賀龍、劉伯承、彭湃、林伯渠等¹²。當時周恩來身患重病，秘密在香港就醫養病約半個月。周恩來第三次來港是 1928 年 3 月，他受中央委派在香港主持召開廣東省委

⁸ 同上。

⁹ 同上。

¹⁰ 陳復生，〈長期打算，充分利用〉，《香港文匯網》，2022 年 3 月 1 日，<https://www.wenweipo.com/a/202203/01/AP621d317de4b036dce998641b.html>。

¹¹ 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聶榮臻堅持地下鬥爭〉，2021 年 7 月 15 日，http://www.locpg.gov.cn/jsdt/2021-07/15/c_1211240510.htm。

¹² 揭陽市檔案館，〈黨史悅讀：南昌起義領導人渡海處〉，2025 年 1 月 8 日，http://www.jieyang.gd.cn/bumen/jydaj/jydaj_fllg。

擴大會議。

此外，鄧小平曾經五次經過香港，主要是通過香港的秘密交通線來往中央解放區¹³；他 5 次在香港停留的時間累計近 3 個月，對香港有切身的感性認識，可能成為他半個世紀後構思「一國兩制」的原始思想素材¹⁴。葉劍英也曾多次到港進行策反工作及籌款，並於 1938 年因病到港就醫，並指導八路軍駐港辦事處工作¹⁵。總括而言，中共眾多高層領導人對香港的特殊地位有切身及深刻的體會。

3. 八年抗戰、第二次國共合作 (1937 - 1945)

如前所述，從 1937 年日本全面侵華到 1941 年底香港淪陷四年多期間，香港是供應抗戰所需的戰略物資生命線。此外，香港因其獨特的國際地位，也是華僑及國際友人支援抗日的樞紐。宋慶齡 1938 年在香港成立保衛中國同盟，向世界宣傳中國抗戰，募集了大量醫藥、物資和捐款¹⁶。港人也組織了香港醫療救護隊等團體赴內地救治傷員。

香港也是文化抗日救亡的前線，特別在廣州淪陷後，大批內地文化

¹³ 文史旺旺旺，〈軍委制定香港接收方案，忽略了武力準備，鄧小平板著臉說了 2 句話〉，《網易》，2022 年 11 月 14 日，<https://www.163.com/dy/article/HM5HKC1U0543K6D6.html>。

¹⁴ 《中國青年報》，〈鄧小平與香港的五次相遇〉，《中國青年報》，2021 年 3 月 31 日，https://zqb.cyol.com/html/2021-03/31/nw.D110000zgqnb_20210331_2-04.htm。

¹⁵ 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葉劍英避居香港〉，2021 年 7 月 15 日，http://www.locpg.gov.cn/jsdt/2021-07/15/c_1211240505.htm。

¹⁶ 見註腳 4。

精英遷到香港，在香港辦報、拍電影，用文藝喚起民眾愛國熱情¹⁷。當時嶺南大學也遷到香港，與香港大學合作，於晚上在港大的校舍上課，這是後來李安導演的著名電影「色戒」的歷史背景。

在 1941 年年底香港淪陷後，香港轉變成為地下秘密鬥爭的關鍵樞紐。1942 年在周恩來指揮下，廣東抗日遊擊隊通過秘密水路和山路，將困留在港的 800 余名文化精英和民主人士（如何香凝、柳亞子、茅盾等）成功護送到後方；這個「秘密大營救」是後來許鞍華導演的著名電影「明月幾時有」的歷史背景。茅盾在其著作中讚揚這個「秘密大營救」是「抗戰以來最偉大的搶救工作」¹⁸。此外，東江遊擊隊也搶救了逃出集中營的英國官兵與戰俘、美軍轟炸香港時跳傘逃生的飛行員、盟軍人員和外國僑民共百多人¹⁹。

4. 解放戰爭、第二次國共內戰 (1945 - 1949)

在此階段，香港作為中國革命“第二戰線”的功能進一步提升，香港扮演了以下多種重要角色：

1. 政治與輿論平臺 - 中共利用香港相對寬鬆的環境，進行宣傳工作、聯絡文化界、新聞界向國內外傳遞解放區的信息。當時中共在香港創辦的主要報刊包括《華商

¹⁷ 王明亮，〈潮湧香江：抗戰中的香港貢獻〉，《中國新聞出版廣電報·實踐版》，2025 年第 9-10，<https://www.zgxwfb.cn/2025/10/31/b9633d12d6294e9abfd76396ed397c02.html>。

¹⁸ 同上。

¹⁹ 許怡真、楊曉敏，〈廣東東江縱隊紀念館的珍貴檔案見證中外並肩抗戰的烽火歲月——軍史鉤沉〉，《華夏經緯網》，2025 年 11 月 25 日，<https://www.huaxia.com/c/2025/11/25/2093638.shtml>。

報》、《正報》、《文匯報》及戰後復辦的《大公報》²⁰。
中共也通過香港安排眾多民主人士、知識分子北上參加
新中國的籌建工作²¹。

2. 人才與文化教育中心 - 內戰期間，身處國民黨區的民主人士及進步知識分子處境艱難。中共安排他們遷至香港，在香港傳播進步文化及興辦教育；包括 1946 年創辦、1949 年被港英取締的大學「香港達德學院」。學院彙聚了當時中國近百名頂尖學者，包括郭沫若、茅盾、翦伯贊、喬冠華、胡繩等，為即將成立的新中國培養人才，被譽為「港版黨校」²²。達德學院校舍主樓現為屯門區的馬禮遜樓，是香港法定古跡。此外，香港勞工子弟學校、香島、培僑、漢華等中學也陸續在此期間成立，為新中國培訓了大批幹部。
3. 物資轉運通道：香港航運便利，成為華北、華東等解放區所需物資（如藥品、通訊器材、工業設備等）的重要中轉站。在中共發動下，部分港商衝破國民黨阻力，開展同北方中共解放區的易貨貿易，大批軍用物資被運往解放區，解放區產品也打開了海外銷路。
4. 金融周轉節點：海外華僑的捐款和物資經香港發達的金

²⁰ 中華全國歸國華僑聯合會，〈史海探源：解放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對華僑輿論宣傳工作的歷史考察〉，2025 年 1 月 24 日，<http://www.chinaql.org/BIG5/n1/2025/0124/c420265-40408604.html>。

²¹ 見註腳 4。

²² 紫荊雜誌社，〈香港達德學院：這裡走出一批中共幹部〉，《紫荊》，2021 年 6 月 7 日，https://bau.com.hk/article/2021-06/07/content_926228704070897664.html。

融渠道送至解放區。

5. 情報與聯絡樞紐：中共在香港設有秘密聯絡點，負責與海外組織、國際友人及華南地區地下工作的溝通協調。
6. 策反國民黨經濟機構的工作樞紐：內戰後期，國民黨軍政官員在內地的不少重大起義也是在香港策動；被策反的機構共有 29 間，包括中國航空公司、中央航空公司（兩航事件）、招商局駐港機構、多間銀行的香港分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中國農業銀行等）²³。新中國接收了這些機構的資產及絕大部分員工。

1949 年新中國成立： 中英兩國如何達成保留香港現狀的默契

對香港而言，1949 年最重要的發展，是中英兩國很快便就香港問題達至默契，維持香港現狀及其特殊地位。歷史資料顯示，這個默契並非白紙黑紙的協議，而是在 1949 年建國前後約一兩年間，通過兩國互相摸底而逐步形成。這個默契，為後來香港在國家發展戰略中長期扮演獨特的橋樑角色奠定了基礎。

二戰後英國企圖儘量保持其帝國（包括香港）的利益，美國卻鼓吹殖民地獨立，希望取代英國沒落中的霸權。當時美國大力支持國民黨，英國卻漸漸看到中共將會勝利，明白到要跟中共打交道才能保持其在中國大陸及香港的利益。英美兩國雖然是親密盟友，兩者

²³ 見註腳 4。

在遠東的利益卻明顯不同。

1948 年年底，中共於遼沈戰役取得決定性勝利，東北全境解放。當時美國雖然對對腐敗的國民黨失去信心，其對華政策卻是猶豫不決，希望等待「塵埃落定」再作決定²⁴。英國的反應卻十分迅速，英國外交大臣在 1948 年 12 月 9 日便向內閣提交了一份奠定英國對華政策基調的關鍵文件。文件認為中共即將取得全國性勝利；並評估在共產黨掌權初期，外資雖然會面對一定困難，不過因為經濟建設的需要，中共會容忍外資一段時期；因此英國的最佳策略不是跟隨美國“等待塵埃落定”或支持敗退的國民黨，而應該是“在中國門內留一隻腳”（keep a foot in the door）²⁵。當時英國內閣迅速批准這份文件，正式確立了“不退出中國”的核心政策基調。內閣會議明確指示：隨著解放軍逐步南下，英國駐華外交機構和僑民“應努力地留在原地，與共產黨建立事實上的聯繫，並尋求在中國繼續進行貿易的可能性”。

1949 年 4 月，國民黨政府在內戰失利，將行政機關從南京遷到廣州。當時絕大多數西方國家，包括美國，都選擇隨國民政府遷往廣州，英國卻根據“留在原地”的政策，將大使館留在南京，標誌著英國不再以國民黨政權為有效的政府，明顯向中共示好²⁶。

如前所述，1949 年 10 月 16 日解放軍勒馬深圳河，沒有進入香港，向英國釋放暫時不準備收回香港的信號。中共同時通過秘密

²⁴Tucker, Nancy Bernkopf, *Patterns in the Dust: Chinese-American Relations and the Recognition Controversy, 1949-1950*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3), 5.

²⁵徐友珍，〈走向承認：英國承認新中國之決策背景分析〉，《愛思想》，2008 年 7 月 14 日，<https://www.aisixiang.com/data/13768.html>。

²⁶ 同上。

渠道向港英政府提出維持香港現狀的“三項條件”：不允許香港成為反共活動的基地，不允許港英政府進行親美或干涉中國內政的活動，以及確保親共組織在香港的合法權利²⁷，為這個默契劃定中國的底線。港督葛量洪收到後條件後“喜出望外”，英國政府亦認為這些條件並不苛刻，當即全盤接受。為了投桃報李，英國不顧美國反對，於 1950 年 1 月 6 日在西方國家中率先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

對中國而言，保留香港現狀不但能夠打破美國封鎖，也可以擴大英美間的矛盾。周恩來曾形象地比喻，香港留在英國人手上，等於“我們抓住了英國一條辮子”²⁸，可以拉住英國，使其在對華政策上不能對美國跟得太緊。對英國而言，面對香港軍事上無法防禦的現實，接受中方的“三項條件”及承認新中國，是保存英國在香港及在中國大陸的商業利益的最佳途徑。

「站起來」：從 1949 年建國到 1978 年改革開放前夕香港角色的變化

1949 - 1978 共 29 年，可以細分為以下三個階段：

1. 國民經濟恢復時期（1949-1952）
2. 社會主義改造、建立計劃經濟（1953 - 1957）

²⁷ 張憶耕，〈矢志不渝收回香港〉，《人民日報》，2012 年 7 月 6 日，https://paper.people.com.cn/hqrw/html/2012-07/06/content_1080900.htm?div=-1。

²⁸ 見註腳 1。

3. 「社會主義艱難探索階段」(1958-1978)：大躍進、文革、自力更生

1. 國民經濟恢復時期 (1949-1952)

中國經濟從內戰迅速恢復，加上韓戰 1950 年 6 月爆發，刺激了中國對戰略物資的需求；中國從香港的入口從 1948 年的七千萬美元猛增至 1951 年的二億八千萬美元，上升三倍；期間香港占中國入口的份額高達三成²⁹；不過 1951 年 5 月聯合國對中國實施戰略物資禁運，是以中國從香港的入口急劇下跌至 1952 年的九千萬美元，只有 1951 年的三分之一³⁰。

聯合國對中國的禁運防止世界各地向中國提供戰略物資，直接影響中國從香港的進口，不過中國可以繼續通過香港出口到美國以外的地區(主要是東南亞地區)賺取外匯；是以從 1951 年到 1952 年，中國對香港出口仍然維持在約一億五千萬美元的水平，一年間只稍微下跌 4%。在 1952 年，中國對香港的出口，仍占國家的出口兩成；惟中國從香港的入口，卻因聯合國戰略物資禁運影響而下跌至國家入口的 8%³¹。

2. 社會主義改造、建立計劃經濟 (1953 - 1957)

在此期間，國家「一邊倒」向蘇聯集團，國營外貿公司向蘇聯集

²⁹ Sung, Yun-Wing, *The China-Hong Kong Connection: The Key to China's Open-Door Poli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19-20, 24, tables 2.3-2.5.

³⁰ 同上。

³¹ 同上，第 19 頁，表 2.3。

團採購及進行貿易，因此中國從香港的入口跌至微不足道的水平；惟香港仍然是中國對資本主義世界及對海外華僑的窗口，中國繼續經香港轉口到東南亞，臺灣也經香港向內地購買中草藥；期間中國對香港的出口維持在之前約一億五千萬美元的水平，占國家總出口 10%以上³²。

香港也是僑匯的重要來源及渠道，以及彙聚人才的平臺及樞紐。中國首席心理學家曹日昌教授在英國求學期間入黨，其後於 1948 年至 1950 年在香港大學任教，受黨指派在香港組織了“中國科協”與“美國科協”的聯絡站，負責動員和接待海外專家取道香港回國服務。1950 年代經這個渠道回國服務的頂尖專家，包括華羅庚、朱光亞、鄧稼先、林蘭英、葉篤正、余國琮、錢學森、師昌緒等³³。他們建設了中國科研體系及成功發展兩彈一星，貢獻至偉。此外，期間也有不少香港愛國青年回國服務。

3.「社會主義艱難探索階段」(1958-1978): 大躍進、文革、自力更生

1950 年代末中蘇開始交惡，中國需要自力更生；中國對外貿易從蘇聯集團轉向資本主義世界，需要通過出口賺取外匯來入口生產設備及糧食。

期間香港成為消費中國產品的最大外銷市場（包括農產品及工業

³² 同上。

³³ 河北醫科大學心理學系〈追憶著名心理學家曹日昌先生〉，2021 年 1 月 11 日，<https://mp.weixin.qq.com/s?biz=MzlyNTY4NzY3OQ==&mid=2247489238&idx=1&sn=f879df7a6aaa27dffbfcef561472ec53&chksm=e87ab7c6df0d3ed0c4fa78289c5f78ddd09797d34740b16058068af51538a863d48a1a4061aa&scene=27>。

產品)。中國對香港出口占其總出口 20%以上 (16%在香港本地消費，其餘 4%至 5%轉口他往)³⁴。加上僑匯及中資企業在香港賺取的利潤，估計中國賺取的外匯有接近一半來自香港本地或通過香港渠道獲得³⁵。

「富起來」：從 1978 年改革開放至 2012 年 中共十八大之前，香港角色至為關鍵

1978 至 2012 共 34 年，可以細分為兩個階段：

1. 1978 - 2000 局部開放 (進入 WTO 之前)：主要開放賺取而非使用外匯的範疇
2. 2001 - 2012 逐步全面開放

1. 1978 - 2000 局部開放 (進入 WTO 之前)

在進入世貿之前，國家主要開放能夠賺取外匯的活動而非使用外匯的活動，例如鼓勵出口 (特別是加工出口) 而非開放本地消費品市場、吸引外資流入而非鼓勵對外投資、吸引外來遊客而非鼓勵民眾外遊。

隨著內地實施鼓勵加工出口，港商通過前店後廠模式在內地建成規模龐大的世界工廠，在內地加工後的產品經香港出口，使用大量

³⁴ 見註腳 28。

³⁵ Time Magazine. Time Magazine, "Hong Kong: Cheer in the Year of the Rooster," February 28, 1969, <https://time.com/archive/6636798/hong-kong-cheer-in-the-year-of-the-rooster/>.

香港的轉口貿易、物流及金融服務。香港迅速從勞工密集的製造業中心轉變成為服務業的樞紐。

香港對國家改革開放的作用至為關鍵。在貿易方面，1990 年代中期，內地約四成出口經香港轉口，再加上經香港的轉運及離岸貿易，約有 2/3 的內地出口由香港處理³⁶。在吸引外資方面，外商在內地直接投資約有 2/3 來自香港；香港也是在內地的間接投資的主要來源³⁷。在旅遊業方面，港客占外來遊客的數目或開支都高達六、七成³⁸。

香港不單止提供資金、加工生產設備、技術及出口渠道，也提供了高度市場化的模式，引領著改革開放的進程。香港靈活的市場力量刺激及牽引內地市場，倒逼內地市場取代計劃的改革，例如人民幣黑市及灰色市場的迅速發展不斷倒逼人民幣匯率的改革。

2. 2001 - 2012 逐步擴大開放

中國在 2001 年年底進入世貿組織，承諾維時六年的時間表逐步擴大開放，以達至世貿的標準。當時國家服務業和金融業的發展仍然嚴重滯後，是高質發展的短板；需要開放本地市場、開放服務業、金融業、並鼓勵對外投資，包括鼓勵本地企業走出去。中國從過往著重賺取外匯的局部開放過程中，累積了龐大的外匯儲備，開始需要放寬使用外匯，包括開放商品入口、鼓勵內地企業對外投資、鼓

³⁶ Sung, Yun-Wing, "Becoming Part of One National Economy," in *Routledge Handbook of Contemporary Hong Kong*, edited by Tai-lok Lui, Stephen W. K. Chiu, and Ray Yep (London: Routledge, 2019), 72, 73–74, 77–78.

³⁷ 同上，第 77-78 頁。

³⁸ 見註腳 26，第 24 頁，表 2.5。

勵民眾外遊等。

作為超級連絡人，香港在這些範疇的角色顯而易見。外商通過香港開拓內地市場，內地企業亦以香港作為「走出去」的跳板。隨著國家鼓勵企業「走出去」，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從 2003 年的 29 億美元爆升至 2019 年高峰的 1,961 億美元，增加了 67 倍；其後稍為回落，在 1500 億美元至 2000 億美元的水平徘徊；這些投資長期有六成左右以香港為目的地（包括了以香港為跳板轉到其他地區的內地資金）³⁹。

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及國際商業及專業服務樞紐，香港為「走出去」的內地企業提供優質的融資渠道、商業及專業服務以及適切的航運和物流服務。作為跨國企業總部的樞紐及平臺，不少內地企業亦在香港設立地區總部，管理在「一帶一路」不同地區的業務。

在開放服務業方面，香港是全球先進的服務業樞紐、國際金融中心及離岸人民幣樞紐，正好引領及倒逼國家逐步擴大開放。2003 年內地與香港簽訂的《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是內地的首個自由貿易協定，也是香港第一個自由貿易協定，協定有關服務業開放的設計，是透過內地率先向香港開放服務業的市場，刺激並增強內地服務業的競爭力，以面對進一步的開放⁴⁰。內地 2003 年開放內地旅客到香港「自由行」，是中國開放對外旅遊的里程碑；自此開啟了中國遊客踏足全球各地的新時代。

中國於進入世貿後的六年（2007 年）完成對世貿的開放承諾，達

³⁹ 見註腳 34。

⁴⁰ 見註腳 33，第 73-74 頁。

至世貿的開放標準。在進入世貿後，中國出口及經濟增長神速，在 2009 年成為全球最大的商品出口國，在 2010 年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並在 2013 年成為全球最大的商品貿易國，人均 GDP 於 2012 年達到 6100 美元，正式突破六千美元大關，達到中等偏上收入國家水平，初步「富起來」。

「強起來」（2012 至今）： 香港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獨特角色

2012 年中共十八大報告提出新的歷史方位 —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標誌著國家的目標，從單純「富起來」轉為多面向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關注的是核心競爭力、文化軟實力和國際影響力等綜合國力的全面提升。

中國的國際戰略從過去的「韜光養晦」變得積極進取，提出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並主導成立了亞投行、發起「一帶一路」倡議；意味著中國不再只是國際規則的適應者，而是開始主動塑造並引領全球治理的規則，從站上世界舞臺，走向舞臺中央。

在「強起來」階段，香港的角色是多方面的：

1. 協助國家按照高水平的國際經貿規則貫徹改革開放
2. 推進國家金融制度開放及人民幣國際化
3. 推進自主創新科技
4. 提升國家軟實力及塑造全球治理的話語權

1. 協助國家按照高水平的國際經貿規則貫徹改革開放

中國于 2007 年，已經達致世貿的開放標準；惟世貿的標準與發達經濟體的高水平開放標準仍然有一段距離，例如在市場准入方面，未能達致採用「准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的標準。不少高水平的貿易協議，如 CPTPP，對勞工權益、環境保護、知識產權和市場准入等都有高要求，間接把中國拒諸門外。中國需要達致高水平的開放，才能引領塑造全球經貿治理的規則。香港是全國最開放的城市，長期實踐高水平的國際經貿規則；與香港對接，是促進國家與高標準的國際貿易規則接軌的捷徑。

2014 年 CEPA 框架下的《廣東協議》，目標是在廣東先行先試，率先實現與香港的服務貿易自由化，是中國首個根據「負面清單」和「准入前國民待遇」設計的自由貿易協議⁴¹。其後中國 11 個自貿區，以及中國與歐盟尚待實施的雙邊投資協議（BIT）也是採取相同的管理制度。十九大及二十大報告都確定中國將採用「負面清單」和「准入前國民待遇」的標準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⁴²。最近深圳前海公佈的 2026 年行動方案，同樣系統與地推動與香港的規則銜接及機制對接，以貫徹高水平開放⁴³。

仲裁對外貿易糾紛是全球經貿治理的重要一環。由於香港具備良好的法律制度及毗鄰內地，香港國際仲裁中心具有國際競爭力。在

⁴¹ 同上。

⁴² 郝身永，〈以制度型開放增強發展新優勢〉，《中國社會科學網》，2023 年 2 月 16 日，https://www.cssn.cn/skgz/bwyc/202302/t20230216_5588542.shtml。

⁴³ 深圳市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管理局，〈聚焦建設深港深度融合發展引領區，前海再出 21 條實招〉，2026 年 1 月 27 日，https://qh.sz.gov.cn/gkmlpt/content/12/12618/post_12618772.html#2361。

國家及香港努力推動下，正是香港發展的亮點⁴⁴。

參考香港經驗，作為國家接觸國際市場的實驗室，積極履行國際責任，將會是中國參與規則制定、領導全球政治經濟治理的必經之路。

2. 推進國家金融制度開放及人民幣國際化

十五五規劃的目標是“加快建設金融強國”，包括優化跨境理財通並推進人民幣國際化⁴⁵。香港是跨境理財通的中心及全球最大的離岸人民幣樞紐，對國家建設金融強國的關鍵角色無可取代。

川普朝令夕改，粗暴使用長臂管轄，美元資產風險因此大幅上升；避險資產隨即大量流入香港。新興市場投資基金研究公司(EPFR)數據指出，從 2025 年 4 月川普開徵所謂「對等關稅」的亂局到 7 月的短短 3 個月，投資基金向亞洲市場淨投入約 915 億美元，其中約 443 億美元淨資金流入中國市場⁴⁶。最近國際金融機構積極擴展在香港的業務，預計香港將在未來數年成為全球最大財富管理中心。美元資產風險上升，正是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的好時機。

3. 創新科技

香港在此有多方面的角色，包括推進基礎科研、彙聚科研領軍人才、

⁴⁴ 香港國際仲裁中心，〈為什麼選擇香港國際仲裁中心 (HKIAC)〉，<https://hkiac.org/zh-hant/arbitration/why-hkiac/>。

⁴⁵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2025 年 10 月 28 日，http://big5.www.gov.cn/gate/big5/www.gov.cn/zhengce/202510/content_7046050.htm。

⁴⁶ 香港新聞網，〈關稅戰後 7137 億資金流入亞洲，內地香港約占一半〉，2025 年 8 月 4 日，<https://hkcn.hk/docDetail.jsp?id=101072130&channel=5695>。

創新科技融資、作為國家創科企業全球化的跳板及「超級連絡人」等。香港基礎科研實力雄厚，擁有五所全球百強大學，能夠與深圳強大的應用科技能力相輔相成，也有利吸引國際頂尖科研領軍人才。香港是重要的科技融資渠道，例如位於香港的六所國家重點實驗室夥伴實驗室，通過香港獲得大量國際科研經費；新興的創科企業，也紛紛在香港上市。

香港的普通法體系、知識產權保護、及專業服務與國際高度接軌，容易建立國際信任，能幫助內地的技術、產品和標準走向世界；香港作為一個較為中立的國際城市，也能夠在複雜的國際環境中，與西方科技界保持交流，成為國家面向世界的科技窗口。

4. 提升國家軟實力及塑造全球治理的話語權

內地社會組織主要由上而下，民間社會不夠活躍，有礙發展軟實力，也削弱國家在國際的話語權。香港是東西文化交匯的橋樑，是國際傳媒中心，也是眾多國際民間團體彙聚的都市，善於適應和處理多元文化社會的矛盾。國家所缺，正為香港所長，香港為國家提供了軟實力的多元對外平臺。

在文化交流方面，「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是香港「八大中心」中的四個「新興中心」之一；有利「一帶一路」倡議的「民心相通」。國家可以透過香港的國際傳媒及國際民間團體網絡發揮影響力。香港有眾多來自東南亞和全球各地的僑社，國家可以透過這些僑社拓展對外關係。

香港是教育樞紐，大學國際排名甚佳，在 QS 全球「最佳學生城市」

的排名亦高⁴⁷，外國學生樂意來進修，香港可發揮其國際教育平臺的作用。

總結

隨著國家在改革開放之後迅猛發展，香港與內地的經濟差距迅速收窄；例如在改革開放前夕，彈丸之地的香港，其總產值竟然高達內地的七分之一，香港的對外貿易量及貨櫃吞吐量更超過內地；惟到今天，香港的總產值，只有內地的 1%；香港貨櫃吞吐量的排名，也從全球第一下跌至第 12、13。不少論者因此誤以為香港已經邊緣化，香港對國家無足輕重。

以上的判斷忽略了今天國家的發展重質而不重量，況且在國家「強起來」的時代，國家要積極參與塑造全球經貿規則及治理規則，在這樣的情況下，香港作為全國最開放及最國際化的城市，其重要性正有增無減。

例如川普在 2025 年 4 月向中國徵收天文數字的關稅，當時香港不少愛國人士倡議香港應該仿效內地向美國徵收報復性的關稅；不過中央明智地維持香港作為自由港的地位；而香港和內地 2025 年的貿易表現，證明中央的決定的確高明。

2025 年面對關稅壁壘，香港出口的增長出奇亮麗，竟然高達 15.4%，遠高於全球的 9.1% 以及中國的 5.5%。2025 年中國經香港轉口的貿易高達 6300 億美元，增長率高達 14.1%。中國外貿經香港轉

⁴⁷ Wang, Zhan, "Hong Kong Rises Five Places to 17th in QS Best Cities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China Daily*, July 16, 2025, <https://www.chinadailyhk.com/hk/article/616016>.

口的比例，亦從 2024 年的 9.0% 上升至 2025 年的 9.9%；此比例在 90 年代中期一度高達四成，後來因內地港口的競爭而迅速下降；然而 2024 年至今的發展卻逆轉了從 1995 年以來長達 30 年的下降趨勢。

香港外貿表現出奇亮麗的原因有三：首先，內地生產鏈搬到東南亞避關稅，以香港作為區域總部及生產鏈統籌中心，生產鏈的物流往往通過香港；其次，香港是電子產品跨國生產鏈的貿易中心，而近年 AI 電子產品貿易增長神速；最後，香港廠商的韌力及彈性，在亂世及面對關稅壁壘「搶出口」的時刻份外凸顯。總括而言，在關稅壁壘林立，風高浪急的國際環境中，香港自由港地位及穩定的經貿政策，凸顯了香港作為國際經貿中心及樞紐的特殊地位。

如前所述，在川普朝令夕改，金融風險高漲的時代，避險資產大量流入香港。隨著美國對華發動金融戰，內地企業紛紛從紐約轉移到香港上市，香港 2025 年首次公開募股（IPO）金額高達 374 億美元，成為全球首位，重奪香港在新冠疫情之前曾保持過 8 年的頭銜（2009–11 年、2015–16 年及 2018–19 年）。2026 年波士頓諮詢公司（BCG）的報告顯示，香港 2025 年跨境管理財富規模高達 2.95 萬億美元，首次超越瑞士登頂全球第一，並且預期未來香港的領先幅度會不斷擴大⁴⁸，有望取代倫敦成為全球排名第二的國際金融中心，能夠有力地支撐國家成為金融強國。

儘管川普政府近年徹底動搖了過去美國自 20 世紀 40 年代末以來苦心構建的自由主義世界秩序，惟香港始終堅守其自由經濟堡壘

⁴⁸ Boston Consulting Group, “Hong Kong Surpasses Switzerland as the World’s Largest Cross-Border Wealth Hub, Driven by Mainland China Inflows,” May 27, 2026, <https://www.bcg.com/press/27may2026-hong-kong-surpasses-switzerland-largest-cross-border-wealth-hub>.

的角色，堅定奉行自由貿易與資本自由流動的原則。半個多世紀以來，香港多年穩居全球最自由經濟體的寶座，地位無可比擬⁴⁹。除著世界局勢日益動盪，香港穩定的自由體制對全球資本與貿易的吸引力將與日俱增，促使香港在世界貿易與金融領域的地位繼續上升。

在美國不斷以貿易戰、金融戰、科技戰多種手段企圖壓制中國崛起的時代，香港的角色尤其重要。今天的危機也是契機。過去香港一直以其韌力、適應力及彈性來面對種種複雜的國際形勢；從歷史展望將來，相信香港仍然能夠不懈地推動國家和中華民族復興。

⁴⁹ 根據加拿大菲沙研究所 (Fraser Institute) 的數據，從 1970 年到 2022 年，香港連續 53 年穩居全球最自由經濟體榜首。儘管香港在 2023 年排名下滑至新加坡之後位列第二，但在 2024 年和 2025 年又重回首位。

參考書目

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葉劍英避居香港〉。2021年7月15日。 http://www.locpg.gov.cn/jsdt/2021-07/15/c_1211240505.htm。

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聶榮臻堅持地下鬥爭〉。2021年7月15日。 http://www.locpg.gov.cn/jsdt/2021-07/15/c_1211240510.htm。

中共中央。〈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2025年10月28日。中國政府網。 http://big5.www.gov.cn/gate/big5/www.gov.cn/zhengce/202510/content_7046050.htm。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黨史悅讀：南昌起義領導人渡海處〉。2025年1月8日。揭陽市檔案館。 http://www.jieyang.gd.cn/bumen/jydaj/jydaj_flfg。

中國青年報。〈鄧小平與香港的五次相遇〉。2021年3月31日。《中國青年報》。 https://zqb.cyol.com/html/2021-03/31/nw.D110000zgqnb_20210331_2-04.htm。

中華全國歸國華僑聯合會。〈史海探源：解放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對華僑輿論宣傳工作的歷史考察〉。2025年1月24日。中華全國歸國華僑聯合會。 <http://www.chinaql.org/BIG5/n1/2025/0124/c420265-40408604.html>。

文史旺旺旺。〈軍委制定香港接收方案，忽略了武力準備，鄧小平板著臉說了2句話〉。《網易》，2022年11月14日。 <https://www.163.com/dy/article/HM5HKC1U0543K6D6.html>。

王明亮。〈潮湧香江：抗戰中的香港貢獻〉。《中國新聞出版廣電報·實踐版》。2025年，第9-10期。 <https://www.zgxwfb.cn/2025/10/31/b9633d12d6294e9abfd76396ed397c02.html>。

史海。〈新中國成立後中共「暫時不動香港」戰略始末〉。2008年11月7日。中國新聞網。 <https://www.chinanews.com.cn/cul/news/2008/11-07/1441344.shtml>。

河北醫科大學心理學系。〈追憶著名心理學家曹日昌先生〉。2021 年 1 月 11 日。微信公眾號。
https://mp.weixin.qq.com/s?_biz=MzlyNTY4NzY3OQ==&mid=2247489238&idx=1&sn=f879df7a6aaa27dffbfcef561472ec53&chksm=e87ab7c6df0d3ed0c4fa78289c5f78ddd09797d34740b16058068af51538a863d48a1a4061aa&scene=27。

香港海員工會。〈工會簡史〉。無日期。<https://www.hksu1946.hk/about>。

香港國際仲裁中心。〈為什麼選擇香港國際仲裁中心 (HKIAC) ? 〉。無日期。<https://hkiac.org/zh-hant/arbitration/why-hkiac/>。

徐友珍。〈走向承認：英國承認新中國之決策背景分析〉。2008 年 7 月 14 日。愛思想。
https://www.aisixiang.com/data/13768.html?_x_tr_sch=http。

郝身永。〈以制度型開放增強發展新優勢〉。2023 年 2 月 16 日。中國社會科學網。
https://www.cssn.cn/skgz/bwyc/202302/t20230216_5588542.shtml。

張憶耕。〈矢志不渝收回香港〉。《人民日報》，2012 年 7 月 6 日。
https://paper.people.com.cn/hqrw/html/2012-07/06/content_1080900.htm。

張曉輝。《香港與近代中國對外貿易》。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2000 年。

深圳市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管理局。〈聚焦建設深港深度融合發展引領區，前海再出 21 條實招〉。2026 年 1 月 27 日。
https://qh.sz.gov.cn/gkmlpt/content/12/12618/post_12618772.html#2361。

許怡真、楊曉敏。〈廣東東江縱隊紀念館的珍貴檔案見證中外並肩抗戰的烽火歲月——軍史鉤沉〉。2025 年 11 月 25 日。華夏經網。
<https://www.huaxia.com/c/2025/11/25/2093638.shtml>。

陳復生。〈長期打算，充分利用〉。2022 年 3 月 1 日。《香港文匯》。
<https://www.wenweipo.com/a/202203/01/AP621d317de4b036dce998641b.html>。

紫荊雜誌社。〈香港達德學院：這裡走出一批中共幹部〉。《紫荊》，2021 年 6 月 7 日。
https://bau.com.hk/article/2021-06/07/content_926228704070897664.html。

劉蜀永。〈香港與中國共產黨〉。2021 年 5 月 5 日。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 http://locpg.gov.cn/jsdt/2021-05/05/c_1211141804.htm。

Boston Consulting Group. "Hong Kong Surpasses Switzerland as the World's Largest Cross-Border Wealth Hub, Driven by Mainland China Inflows." May 27, 2026. <https://www.bcg.com/press/27may2026-hong-kong-surpasses-switzerland-largest-cross-border-wealth-hub>.

Sung, Y. W. (1991). The China-Hong Kong connection: The key to China's open-door policy (p. 19, 20, 24; Tables 2.3-2.5).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ung, Y. W. (2019). Becoming part of one national economy. In T.-I. Lui, S. W. K. Chiu, & R. Yep (Eds.), *Routledge handbook of contemporary Hong Kong* (pp. 72, 73-74, 77-78). Routledge.

Time Magazine. (1969, February 28). Hong Kong: Cheer in the year of the Rooster. *Time Magazine*.

Tucker, N. B. (1983). Patterns in the dust: Chinese-American relations and the recognition controversy, 1949-1950.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Wang, Zhan. "Hong Kong Rises Five Places to 17th in QS Best Cities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China Daily*. July 16, 2025. <https://www.chinadailyhk.com/hk/article/616016>.

滬港發展聯合研究所 Shanghai-Hong Kong Development Institute

滬港發展聯合研究所於二零零一年成立，旨在凝聚復旦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的研究力量，提高大學的研究水準；根據社會發展的需要，聯合研究重大戰略性、前瞻性、緊迫性課題，以科學的方法和態度，及新觀點和新視野，向政府部門和企業機構等提供政策性建議，提高大學對政府決策的影響力，為上海和香港經濟持續繁榮發展和社會和諧進步作出貢獻，以及為地區和國家整體謀求更大的福利。

The Shanghai-Hong Kong Development Institute (SHKDI) was established by Fudan University and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in 2001. The Institute aims to raise the level of research of the universities, provide policy advice to both the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s on issues of strategic importance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influence of the universities on governmental policy, help Shanghai and Hong Kong achieve sustained prosperity and deeper integration with the global economy, and achieve the greatest benefits for the region and nation.

聯席所長

陳詩一教授（復旦大學經濟學院）

杜巨瀾教授（香港中文大學經濟學系）

Co-Directors

Prof. Chen Shiyi (School of Economics, Fudan University)

Prof. Du Julian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聯繫方式

中國香港沙田

香港中文大學

王福元樓 604D 室

電話：852-39439776

電郵：shkdi@cuhk.edu.hk

網址：<http://shkdi.cuhk.edu.hk>

中國上海市

國權路 600 號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

電話：86-21-65643135

電郵：admin_econ@fudan.edu.cn

網址：<http://shdi.fudan.edu.cn>

Contact

Room 604D, Wong Foo Yuan Buildi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tin, N.T.

Hong Kong, China

Phone: 852-39439776

Email: shkdi@cuhk.edu.hk

Website: <http://shkdi.cuhk.edu.hk>

School of Economics

Fudan University

600 Guoquan Road

Shanghai, China

Phone: 86-21-65643135

Email: admin_econ@fudan.edu.cn

Website: <http://shdi.fudan.edu.cn>